

回忆我的科技扶贫、科技兴市经历

○ 魏志渊（1964 无线电）



魏志渊学长与夫人近影

1958 年秋，我进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学习，1964 年秋毕业留校任教，在清华工作了整整 20 年。其间，1964—1966 年在北京郊区参加了两期农村“四清”；1966—1970 年经历了清华园的“文革”和武斗；1971—1978 年，随无线电系迁至四川绵阳，创建清华大学绵阳分校；打到“四人帮”后，无线电系重迁清华园，1978—1984 年，我参与了系里的教学与科研工作，后担任教研组党支部书记。1984—2000 年，由清华大学调往国家科委（现国家科技部）工作，先后任处长、司副总工程师及副局长等职务。特别是在 1990—1991 年，我担任国家科委陕北科技扶贫团团长并兼任延安地区行署副专员，指导与参加陕北地区的科技扶贫工作。1995—1997 年，由国家科委下派四川省绵阳市，担任副市长两年，指导“科

技兴市”工作。2000 年底从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领导岗位上退休，回到清华园的蓝旗营小区生活。退休后，被中国老教授协会聘请先后担任协会常务理事、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务，在中国老教授协会工作十余年。至 2014 年，我践行了蒋南翔校长提出的“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”的要求。回顾这五十年，尽管国家巨变，岁月峥嵘，但清华情结，牢记心间。

1984 年秋，通过师弟冀复生（1966 无线电，曾任国家科委高新技术司司长）的推荐，在征得学校和系里有关领导同意后，我由清华大学调往国家科委，先后从事科技财务管理、科技行政管理、科技企业管理和全国科技奖励管理等工作。在科技战线工作 16 年中，印象最深的是参加基层的“科技扶贫”和“科技兴市”工作。

1991 年整整一年，我作为国家科委陕北科技扶贫团团长（同时兼任延安地区行署副专员）进驻革命圣地延安，负责陕北延安、榆林两个地区 25 个县的科技扶贫工作。当时西安至延安未通火车，又无高速公路，北京飞往延安的小飞机每周只有一个航班，交通极为不便。记得我们首次从北京赴延安是乘坐运七小飞机，整整费时三天。第一天中午到首都机场待机，晚 6 时通知飞机停飞，人被送到有关旅馆过夜；第二天早上专车把我们拉到机场，

一直等到下午5时才登机起飞。但飞机只到太原，乘客停歇在太原机场旅馆。当时尚无手机，通讯不发达，延安方面未接到人，北京科委方面不知扶贫人员下落，双方干着急，甚至打电话给我家询问下落，还引起家人的较大恐慌。直到第三天上午，运七飞机才晃晃悠悠地从太原机场起飞，中午抵达延安。正常两个小时的航程，我们整整飞了三天！

那时下基层工作绝非“镀金”，都有一股革命干劲。扶贫团长驻陕北，经常下乡调研扶贫项目，几个月才回一趟北京休整。我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：

第一，我们的足迹走遍了延安地区的13个县和榆林地区的7个县，深入农村和农户，亲身经历“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大风从坡上吹过”的情景。可以说，我们的行动是现在“走基层”的先行者。

第二，改变了过去的扶贫方式，变“输血型”为“造血型”。即不把扶贫的钱款平均分给农民作救济款，而是携带部分科

技开发经费支持当地有发展前景的科技支柱产业。现在已经形成气候的陕北富士苹果、黄河之滨的虎头大枣和土豆深加工产品等，都是当时国家科委扶贫团首先开始资助和扶持的。

第三，1991年一年之内，通过精心策划和有效协调，成功地邀请了当时两位国务院领导——国务委员宋健、陈俊生来陕北考察，指导扶贫工作，并且在延安隆重地召开了规模较大的全国科技扶贫工作经验交流会，提升了陕北地区和扶贫工作的软实力。

1991年底，当我从榆林地区的绥德县前往米脂县考查时，途中发生了车祸，造成严重的脑震荡和脑挫裂伤，只好回京治疗，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扶贫工作。

“听话出活”是清华人的优良传统，也是社会上愿意使用清华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在西北地区科技扶贫工作结束三年之后，我又响应国家科委的号召，奔赴西南地区“科技兴市”。1995—1996年，我



1961年9月，清华大学团委宣传部全体干部合影。第一排右7为魏志渊学长

□ 我与清华

来到国家科委军转民“科技兴市”重点联系和实验市——四川绵阳市，任副市长，分管科技、高新技术开发区、教育等工作。

在我担任副市长两年期间，走访了绵阳市所属的9个区、县（市），与中国工程物理院、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中心和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624研究所等国家重点国防研究院所，以及长虹电子集团公司、涪江有线电厂等国营军工大型企业，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，协助绵阳市委、市政府加大军转民科技兴市力度，实施“3115”科技工程。两年中筛选和提出启动项目75项，安排启动资金2200万元，完成投资近5亿元。这些项目预计新增产值120亿元，新增销售收入70亿元，新增税收25亿元。为了推进绵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第二次创业，我为市委、市政府组织协调和起草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快绵阳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的决定》，为其二次创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和政策环境。刚建5年的绵阳开发区，当时其综合经济指数排序已进入全国51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前20名。尤为可喜的是，开发区通过几年改革实践和有意识的锻炼，逐步培养了一批年轻干部，四川省委充分重视和肯定开发区干部管理和培养的做法，并于1996年9月5日在《四川日报》头版头条并加编者按，介绍和推广绵阳开发区的经验。1996年4月，我在绵阳市还和清华校友、学弟吴靖平（社科系研，现任四川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）一起，组织当地清华校友数百人，欢庆清华建校85周年。

如今，绵阳市的经济实力已由清华大学绵阳分校所在时期（1976年）的全省第8位，跃升到我离开时（1997年）的

全省第3位，仅次于重庆和成都（当时重庆尚未直辖）。绵阳的“科技兴市”已开出灿烂之花，初步结出丰硕之果。

退休之后，通过张慕萍学长的动员、推荐，从2001年，我在中国老教授协会又工作了14年，实践了“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”的口号。

在协会工作期间，最感充实和颇有成就感的是，从2010年起，历时4年多，完成了受教育部社科司和科技司委托开展的《大师风范》专项课题研究工作，并组织撰写《大师风范》（“人文社科类”和“自然科学及工程科学类”）丛书。丛书遴选了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各学科领域卓有建树的66位学术大师，组织了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北大、清华、北师大、复旦、浙大等30余个单位的87位专家、学者，分别对相关材料进行调查研究并成文集结。

2014年6月于蓝旗营小区

（上接第78页）

相比从事其他工作的清华同学，我们这些通过学校选派挂职走向地方工作岗位的干部，都是在母校的大力推荐下才有了最初的工作机会和后续的发展。母校不仅传授给我们知识技能，赋予我们干粮猎枪，还给予我们无尽的关怀帮助，为我们搭建了最初的事业平台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我们都要不辜负母校的期望和重托，用实际行动体现清华人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的精神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、无私奉献，在国家新一轮发展进程中展现清华人的身影，体现清华人的价值。

（原载《天府清华人》2014年5月）